

傅 高 义 中 国 研 究 译 丛



[美] 傅高义 (EZRA F. VOGEL) 著
凌可丰 丁安华 译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先行一步： 改革中的广东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先行一步： 改革中的广东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美] 傅高义 (EZRA F. VOGEL) 著

凌可丰 丁安华 译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 / [美] 傅高义 (EZRA F. VOGEL) 著；凌可丰
丁安华译.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5 (2008年6月重印) 2008.6
(傅高义中国研究译丛)

ISBN 978 - 7 - 218 - 05759 - 0

I. 先… II. ①傅…②凌…③丁… III. ①地区经济—经济发展—研究—广东省 ②社会发展—研究—广东省 IV. F127.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7501 号

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

著 者 / [美] 傅高义 (EZRA F. VOGEL)

译 者 / 凌可丰 丁安华

出 版 者 /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 510102

总 经 销 /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经 销 / 各地书店

责任编辑 / 倪腊松 崔肇钰

整体设计 / 卢小雅 + 何 筠

责任技编 / 周 杰 黎碧霞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25.75

插 页 / 4

字 数 / 390 千

版 次 / 2008 年 6 月第 2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 - 5000 册

书 号 / ISBN 978 - 7 - 218 - 05759 - 0

定 价 / 49.8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 (020 - 83795749) 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020 - 37579604 37579695】



2006年6月7日，傅高义教授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作学术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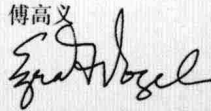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HARVARD UNIVERSITY • 1737 CAMBRIDGE STREET • CAMBRIDGE, MA 02138 • TEL: (617) 495-4046 • FAX: (617) 495-9976

Ezra F. Vogel, ~~Professor~~
Henry Ford II Professor of the Social Sciences

授权书

我于1989年撰写出版了一本关于广东省改革开放最初十年变化的书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1990年我曾委托凌可丰高级工程师等将其译成中文，并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现在我再次授予广东人民出版社在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修订再版发行该书中文简体与繁体字版本的权利。

傅高义
傅高义

Ezra F Vogel
2007年8月4日

再版说明

200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民间，各行各业都在回首这30年来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丰硕成果、巨大变化、深刻变革以及所经受的挫折，总结30年来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而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南风窗和试验场，是引领我国改革由点到面、由浅到深发展的领头羊，广东的回顾和总结自然就有着格外典型的意义，这样一个内容自然也就成了2008年我国出版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和重中之重。

实际上，将中国从经济崩溃的边缘拉回来，重新走向繁荣昌盛之路的改革开放这一壮举，从一开始就引起了举世的关注。30年来，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过程中，无论广东、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对我国改革开放各个方面的探索和研究一直都在进行，从未停止过，并且成果斐然。其中，具有“中国先生”美誉的美国哈佛大学傅高义（EZRA F. VOGEL）教授研究广东改革的著作《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无疑是一部难得的力作。

该书既阐述了广东改革的动因、性质、过程，又分析了广东不同地区在改革过程中的不同变化和进程；从省的领导人到工厂的厂长，从国家职工到个体户，从典型人物到社会群体，都有相当细致的透视；无论是论述广东前10年改革（1979—1988年）的巨大成就，还是报道广东改革所存在的问题，著作者都力图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做出客观的评述，并没有哗众取宠、言过其实或恶意攻击之意。正如著作者本人在前言中所声明的，本书主要是写给西方人看的，要按照自己独立的观点来描绘和叙述，即既讲广东改革积极的一面，也讲其消极的一面。作为一名外国学者，他的政治观点、思维方式以及遣词用语都与我们有所不同，一些观点、提法也与我们的不一样，可供我们参考借鉴。

通过对广东改革的深入考察，傅高义先生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利

于美国的利益，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因此，该书出版后，其全面客观的分析实际上起到了化解当时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对中国敌视态度的作用。当1991年5月本社首次出版该书中译本的时候，也立即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和广泛的影响。

时隔18年之后，我们很荣幸地得到傅高义先生的再次授权，在凌可丰、丁安华先生译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修订工作主要由崔肇钰、黄洁华两位女士完成，陈植荣先生帮助翻译了傅高义先生专为本书再版而撰写的前言，尤其是韦羽博士花费了很多精力和时间补译了原著大量的注释，使译本更加全面、更加严谨。更令人高兴的是，傅高义先生还同时将其早先一部研究广东的著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的全球中文版权授予了我社。傅高义先生的这两部书前后相续，正好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广东当代史，能让我们较为清晰而完整地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如何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而如何走向改革开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先行一步的艰难曲折的伟大历程。值此纪念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再版《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以及同时出版与之有关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此时此刻，我们当然不会忘了感谢17年前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引进中国并将其译成中文的凌可丰、丁安华先生，要感谢当时我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何天静先生，以及凌先生《译后记》中提及的当时为此书提供过帮助的所有人士。正是由于他们的睿智、见识与努力，才使得中国的读者有幸能看到傅高义先生这部全面考察和研究广东改革开放最初10年的力作。此前，作为本书修订再版的责任编辑，我曾试图通过何天静先生与凌可丰、丁安华先生取得联系，商议修订再版事宜，但无法联系上，只好另作他图。我希望二位先生看到本书再版时，能主动与我们联系，我们将面致谢忱，并履行我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编者

2007年12月

第二版前言

第一次出版《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是18年前了，到了今天，我很高兴能够出版这本书的中文版，而且，我的第一本有关广东的书《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也将有中文译文献给读者。我尽我所能，在《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中描绘着1949年至1968年20年间广州的变迁，而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则是记述了广东1969年至1989年20年的发展史。

这两本书的调查研究方法是截然不同的。我写《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时人不在中国大陆，主要依靠对广东的各种日报持续20多年的关注，以及在与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交谈中得到信息；而在完成《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之前，我已经在广东境内住了7个月，亲眼见到了很多事情，但相比较于前者，我就没有对这20年间的新闻出版做详细的研究。

虽然我已经尽力更多地去研究中国，尤其是广东，但邓小平在1978年12月和1982年之间推动改革之时，我还是觉得自己在认识上没有准备好。我不惊讶于把土地分发到每一个家庭的决定，因为我之前就了解到很多生产队一直在寻找合适的途径让小群体，甚至是单个家庭来承包生产。真正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听说了人民公社在1982年正式被废除。我曾想过，也许人民公社会被分权管理，但我确实没有想象过它会被废除。这件事教会了我一点：中国的中央领导层也许在酝酿着一些重要的改革，即便是中国的中层阶级也无法预料，更不用说我们外国人了。

得以完成《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归功于一次很特别的访问整个广东省的机会。在80年代初，广东省就与美国马萨诸塞州（也称麻省）（the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建立了姐妹关系。麻省的州长

因为知道我曾经写过一本有关广东的书，便指定让我加入一个研究麻省姐妹省份关系的委员会。在委员会里，鉴于我对广东的情况较之其他的成员了解得更多，而且我还会说普通话，我便有幸会见了广东省来访的高层领导，如当时的梁灵光省长、朱森林省长、杨立副省长和其他一些在广东省经济委员会杨迈主任领导下的官员。此外，麻省前州长迈克杜凯吉斯（Michael S. Dukakis）出访广东时也曾让我随行翻译。

1986年，杨迈问我是否有兴趣研究广东。当时广东省正希望吸引外资入粤，但因为还没有出现良好的“投资气候”，很多外国人对投资广东都持谨慎态度。杨迈认为社会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而应该是一个更大的整体情况，包括社会现状和经济情况。杨迈知道我是一个社会学家，也知道我比其他外国人更了解广东，认为我会比别人更适合来做这么一个研究。我当时曾告诉他，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去到延安时，他是一名记者，他可以满腔热情地正面记下毛泽东在做的事情，但我作为学者，我的工作是为人们提供一个不偏不倚的描述，包括正面的，也包括负面的。杨迈说他们理解这一点，但他也很自信地说到，如果有外国人可以对广东的实况做出客观的报道，那将有可能有助于改善这里的投资气候。

1987年，我携带着我的太太艾秀慈（Charlotte Ikels），开始了为期7个月的广东行。我的太太曾在香港学习过广州话，她来广东研究这里的家庭生活，后来她还出版了一本专著《财神归来》（*Return of the God of the Wealth*）。在她与人们说着广州话时，我自己则是与官员们用普通话交流。当我被委派到广东省经济委员会后，委员会还为我选定了出色的助手——年轻的窦新元，来协助安排我的行程和约见。我坚持自费完成我的广东行，因为我需要保持我的客观性，也要让外界清楚我并没有受到官方的资助。

在南粤大地上，我亲自去过广东100个县中的70多个，还得到了来自省经济委员会官员的关于30多个县的简报。在一个县里，通常都是市经济委员会的主任担任副县长，负责这个县的工业发展。

同一时期里，据我所了解，没有第二个外国人得到过这么一个机会可以从广东的内部来考察这个省份。我因此感到更有责任来记录这个省

的很多细节，力求把广东的发展实情提供给西方的学术群体。

1980年，我曾在广东停留过两个月，而从那以后，我还每年至少访问广东一次，这使我见到了改革给广东带来的变化。虽然政府是在1979年和1980年便开始踏出了改革的大步，但人们是在几年之后才真切感受到改革的进行。

1980年首次在广东时，我可以很容易判断出街边的一个年轻女士是香港人或是本地人，因为她们的衣着与神态确实非常不同。而到了80年代中叶，要做出正确的判断有时就变得有点困难，因为年轻的广东女士已经有能力购买更好的衣物，也变得更有时尚意识了。等到了90年代，已经几乎不可能再做出判断了。

我动笔写书时，我还没有拜会过原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这个在1980年到1985年间领导广东的关键人物。我在书中对他的描述全然来自于道听途说，说他的成就，还说他是如何取得成就的。在这本书出版后，我才有好几次的机会与任仲夷见面。在与他的讨论中，我确认了我之前写书时对他的理解：他确实确实是一位杰出的领导。在80年代初，当新的事物出现时，它们不是黑色，也不是白色，而是处于一种淡灰色的状态。在很多时候，广东的改革正处于一个尴尬的处境：谁也不知道新的法子是否行得通，即使行得通，谁也不知道它能否得到北京的认可。哪种方法可以在广东试行，且又如何得到北京的理解和支持，任仲夷那时也正处于艰难的地步。实际上，当时北京方面的很多官员正准备着批评广东对市场经济的冒失推进。

在我看来，西方的学术群体对广东发展的重要性还是没有足够的认识。一些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书里，几乎没有提到广东以及它在整个改革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我的理解是，在其他地方推行新方法之前，在广东、福建进行的实验非常关键，尤其是在当时四大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以及厦门的试行。当时几乎所有的高层领导，除了陈云和李先念外，都来过四大特区，实地视察了改革的发展情况。

与其他省份相比，广东同样也赢得了更多的外汇，直到今天还占据着中国外汇收入的40%。尤其是在80年代，中国当时正苦于外汇不足，而广东所赚得的外汇恰好帮助中国政府有能力引入国外先进的设备以生

产更多的产品，这更突显出了广东对外开放创收外汇的重要性。之后，来自香港和广东的投资者运用他们的成功经验，奔走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帮助发展经济。其他省份的政府也在广州和深圳设立了办事处保持联络，同时派出官员接受培训，学习如何施行新的方法。因此，广东，这个中国的南风窗，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培训基地，服务于其他各省前来取经的官员。人们通过现代的传播媒体，尤其是电视，在中国各地都可以了解到广东和四大经济特区具体是如何发展的。

在研究广东发展的时候，我只专注于我的工作，没有去留意北京方面对广东持不同意见的官员以及他们的看法；我只是大概了解到，那些深信改革开放的人对广东的发展表示支持，而另外一些人则显得没有激情，因为他们认为保持计划经济非常重要。

直至今日，在这本书首版的18年后，新一代人都已经长大，但他们却没有机会了解广东的今昔故事。对于这本书，我希望它可以帮助唤起那些曾经积极投入到改革开放中的人们的回忆，回顾他们在1978年后所取得的成就，同时可以教育新一代，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改革开放刚开始的那个年代，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根。

哈佛大学社会学系
荣誉退休教授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cursive script that reads "Fred Vogel". Below the signature, the Chinese characters "傅高义" are written in a similar cursive style.

2007年10月
(陈植荣译)

第一版前言

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到以市场为主的较为开放的商品交换经济，是现代世界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如何采取更大的灵活性，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以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正是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当前努力的方向。

1973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从1979年以来，我每年都访问广东。1980年夏季，我在中山大学花了三个月的时间，从事经济改革初期形势的研究。1987年和1988年，在这方面又花了八个月的时间。本书的内容主要以在此期间的研究成果为基础。

作为一个美国学者，我的目的是向西方读者介绍广东的发展情况。我力图尽可能客观地把实际情况准确地描绘出来。我知道我的观点与中国官员的观点不尽相同。他们完全不必对此负责，因为这不过是我向西方读者介绍广东发展的一项研究成果而已。我很高兴这本书能与中国人民见面。如果有人觉得我对形势的理解有错误，欢迎提出批评意见。

本书（指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的英文版，编者注）出版后，我曾于1989年和1990年夏季再次访问广东。自本书脱稿以来，广东也像全国其余省份一样，一直执行紧缩政策，以控制发展过快、通货膨胀和种种不合规律的经济过热现象。在经济紧缩的影响下，广东境内的投资和一些消费品，特别是高档消费品的购买力下降了。1988年以后，除了住房以外，大城市的高楼建筑工程大量削减了。在新的投资减少的同时，居民的储蓄额却迅速上升。而1989年以来，出口额也同时大幅度增加。对许多企业的财政计划却一直控制很紧。

1988年以后，总的经济增长率是放慢了。但广东对经济紧缩的新形势很快便适应，因此广东的许多企业能继续努力生产，继续提高其效率和生产率。广东省给中央政府的上缴利税金额持续显著增长。

虽然基建投资有所削减，但改革的基本政策仍在继续。当初广东享有特殊政策，并获得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机会时，曾经出现过经济迅速增长的势头。这一基本趋势在1989年和1990年仍在继续。在新技术和管理技能方面，广东已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一旦紧缩政策结束，这一基础将能保证下一阶段的高速发展。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stylized cursive characters. The signature is written in a fluid, expressive style, with the name 'Zhu Rongji' clearly identifiable. Below the signature, the Chinese characters '朱镕基' are written in a similar cursive style.

1990年7月

导言：广东省的实地调查

1973年，当我初次访问广东省时，即使是对参观者开放的工厂，也是机器陈旧，维护不善，常因忽视安全措施或设备、材料和能源供应不足而停工。管理人员缺乏专业知识，工人也提不起工作兴趣。自1967年以后，大学就没有正常开课。在省会广州，运载货物多半使用冒烟的柴油拖拉机和人力三轮车。国产的大型货车既运货又载人，人们就站在后面敞开的车厢内。市内公共汽车很少，小汽车几乎没有。许多商店已不营业，销售的商品量少、质差。肉菜市场既小又冷清。到处看不到任何建设工程。在样板人民公社平洲，只有几间小工厂，包括农机修配厂在内，大部分都用手工操作。农村的货物多半用柴油拖拉机、牛车和肩挑运输。道路不平，有些连自行车也难以通行。人们害怕被别人看到自己与外国人接触，更不用说与之坦率交谈了。

1979年和1980年我再度访问广东，发现变化不大。1978年农村人均年收入仅为193元，稍高于100美元。城市居民人均年收入也只有402元。1980年全省农业人口仍然占80%。

然而，自1980年以后，我年年访问广东，每次都感受到显著的变化。到1987年，广州的人力三轮车已绝迹，柴油拖拉机也禁止入城了。公共汽车已很普遍，货车也极少载客了。除自行车之外，公路上的出租汽车、面包车、小汽车和摩托车络绎不绝。街道上商店林立，货源充足，顾客盈门。露天食品市场宽敞、喧闹，出售的食品种类比以前增多。到处可见新的大厦和建筑工地。数十间工厂已有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平洲公社所在地已扩建成一座小城镇，拥有许多大型新工厂、一家现代化宾馆和许多公寓楼房。公社到处是一片热闹繁荣的景象。农村里铺筑了许多道路。全省每个农户平均拥有的自行车数量，从1978年的0.55辆增加到1986年的1.39辆。在农村的公路上，货车和面包车已大量代替了柴油

拖拉机。到1987年，农村人均年收入已增加了两倍多，达到64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平均增长率为11%。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已提高到1233元。^①多数人乐意公开谈论自己的生活 and 议论自己的政府。

在毛泽东逝世两年后，邓小平开始推行改革。1978年12月，他制定了沿海地区发展新战略，以推动经济发展。上述这些变化，正是推行新战略所产生的结果。在这之前，为了平衡资源，减少外强觊觎和袭击的危险，毛泽东从沿海地区调拨资源去建设内地较穷的省份，代价往往很大，却收效甚微。邓小平决定允许沿海地区以较快的速度发展，试行新制度，使之变成推动中国其余地区发展的动力机。在沿海诸省份中，广东省具有独特的优势。它位于远离北京的最南部，海岸线长达2400公里。用它做试验，不必担心因政治或经济的混乱对首都带来威胁。因为在重工业和国家财政收入方面，广东所占比例不大，危及国民经济的风险很小。由于毗邻香港，广东是中国通向世界的最方便之路，又最有条件试验有用的外国技术和管理方法。因此，中国允许广东带头试验，正如口号所提的：先行一步。

广东开始发展的时期，正是苏联及东欧诸国考虑改革之时。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到，在使人民致富的目标上，它们已经落后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开始考虑变革社会主义体制，包括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甚至包括共产党领导的模式。中国的前总书记赵紫阳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会议上，以外交辞令宣称，社会主义国家并非进行改革竞赛，而是以自己的方式推行改革。但在实际上，中国在苏联戈尔巴乔夫开始其改造的几年前就已开始经济改革，并且比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更为深入。而在中国内部，广东省的改革又比其他任何省份搞得更活。如果说广东的改革在中国是先行一步，那么对于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也许就是先行两步了。

广东是一个亚热带省份，在改革前其面积相当于欧洲一个主要国家，达21.2005万平方公里，人口持续增长，已近6000万。广东的对外贸易可追溯到公元8世纪，长期以来就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前哨。当1699年英

^① 数据来自《南方日报》，广州，1988年8月1日。

国在广州建立常驻贸易机构以后，广州就是外国“对华贸易”的中心。自1760年到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广州又是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直到1949年，广州一直是中西方交往的中心。

广东人比其他省的人有更多的出国机会，并带回更多西方的东西。因深感于西方国富兵强，广东的爱国志士奋起迎接列强的挑战。鸦片战争便是在一批抗英志士的发动下，在广东打响的。1898年发动改革清王朝（1644—1911年）的维新运动领导人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广东人。1911年民主革命领导人孙逸仙的祖籍也在广东，他还在广州建立了国民政府。蒋介石曾任广州郊区的黄埔军校校长，并依靠该校的毕业生建立了其早期权力基础。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其革命生涯，并在那里发展出农民革命方略。

但是，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的精神中心并非在广东或其他沿海地区，而是在中国内地。中国从1949年以后便对资本主义世界关上了大门，专心致志对内，不再需要与外界联系的渠道。共产党领导人对广东沿用同样的政治结构、同样的政策，搞同样的运动，与其他省份没有两样。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中国不仅把新的经济投资着重放在内地，而且在政治上也变得内向和排外了。过于西化或资本主义化的人，或有海外关系的人均受到怀疑，人人但求自保。没有一个省份比广东更适合于作为批判的靶子，也没有一个省份比广东更彻底地为中国的闭关政策所扭曲。

1978年开始的改革使广东恢复了其历史的作用，那就是迎接西方的挑战，使国家富强。然而，历史的背景却完全变了。中国此时已是一个独立强国，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广东不再需要扮演抵御外强的角色，而是要在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中领先。这种新的背景还包括提高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力和大大提升科技与教育方面的水平。虽然广东对扮演这一角色已有历史基础，但70年代的重新开放对整个体制的冲击，并不亚于1949年关门时的震动。习惯于执行毛泽东主义的领导人，这时不得不研究西方的管理和技术，搞政治斗争的人加入了为工业效率而斗争的行列。还有那些一直谴责资本主义的人，现在也反过来向曾经被他们谴责过的人学习。这种转变绝不会是轻而易举和皆大欢喜的，因为并非所有的西方模式都能被人们认可。广东的作用之一，就是从众多的外

国经验中筛选出有用的东西。

广东的领导人意识到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但在毫无经验而且复杂的新情况下，他们中的许多人害怕会犯错误。他们的目标是将一个教育落后、贫穷而封闭的省份带入现代世界之林。改革的头10年生气勃勃，但也出现了混乱，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87年我应广东省政府的邀请，用7个月的时间对自改革开始以来广东各方面的进展进行研究和报道。接待我的单位是负责全省经济发展的经济委员会。听说，我和我的妻子是首次获此邀请的外宾，也是获邀长期下榻在广东迎宾馆内的仅有的两位外国人。我不清楚还有哪位外国人得到类似机会专门研究中国的一个省份。

广东的官员要进行这样一项研究有几方面的用意。他们知道，广东的外国投资环境并不尽如人意。但他们相信，广东省的成就和放开程度远远超过多数外国人的了解。如果广东的近况能够得到客观的报道，将会有助于改善外资的投资环境，让投资者更好地了解其机会和前景。省领导人意识到，如果由官方自己宣传，效果容易被打折扣，而一个外国学者的报道将会更加令人信服。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想寻求一种既适合中国传统，又符合世界现实的社会透视。所以，他们乐于接受一位对有关国家和地区有较多经验的局外人的观点。

从与省级领导人的谈话中，我相信我之所以受邀请前来广东，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首先，由于我是对广东各方面发展作过专门研究的外国学者，中国官员只有极少数人会讲英语，而我能阅读中文资料，也能用普通话进行采访。这样，与我共事就省事得多。有几位省级官员读过我的早期著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和政治（1949—1968）》，有看原文的，也有人看内部发行翻译版本的。他们对书中的观点未必全部同意，但都承认这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由此他们了解到，我熟悉他们的组织结构、政策，以及广东的城市和县份。他们也知道，当1980年夏季改革刚刚起步时，我在中山大学逗留了3个月，这为我追踪报道广东的变革打下了基础。

其次，我和好几位广东省主要领导人建立了可信赖的个人关系。由于马萨诸塞州和广东省在旧中国有过贸易关系，两地在1983年又结成了